

“夏王朝”考古：学术史·新动向·新思考

许 宏

一 中日学界的不同动向

2010年3月，日本驹泽大学饭岛武次教授在我所做了一场题为《二里头文化と夏王朝の年代》的讲座。其中他谈到其在《中国考古学概论》一书^[1]中，已“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时代的文化应是合理的”。而同一年，日本京都大学的冈村秀典教授则出版了《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2]，从书名即可知是明确提出“夏王朝肯定论”的著作。在2003年以前，日本学者基本上没有肯定夏王朝存在的，可以说2003年是日本关于夏文化考古认识的转型年。除了上述两位之外，其他日本学者也有开始持“夏王朝肯定论”者，如宫本一夫教授等^[3]。2012年，饭岛武次教授的《中国夏王朝考古学研究》（同成社（東京））出版。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坚信夏王朝的存在是数十年来学界的主流认识。“证经补史”情结与研究取向，使得中国学者在数十年夏文化与夏商分界探索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围绕某大遗址是夏都还是商都的“郑亳说”、“西亳说”等论战构成奇特景观。

但自新世纪前后，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反思，逐渐接受20世纪上半叶以“古史辨”为核心的反思传统，以及海外学界相对保守严谨的态度和观点，“超脱”出原有的话语系统，出现了质疑传统的“夏王朝可知论”的声音，提倡“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主张没有当时的有足够历史信息的文书类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4]，形成两大话语系统并存的局面。这与日本学者开始认可夏王朝的存在（当然每个人的考虑不同）形成对照。

二 冈村秀典教授新著评价

冈村秀典教授的《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出版不久的2004年年初，我正在日本做学术访问，第一时间获赠冈村先生的大作，一气读完，非常兴奋。在这部书中，冈村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界某些思维方式的评价入木三分，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在反思的。同时，他又最大限度地给中国考古学界的不懈努力以肯定的评价。

按我的理解，尽管书名上醒目地用了“夏王朝”，冈村先生的理念不同于中国学者的主流认识，他们往往积极地将文献与考古资料作简单的比附。作者是把这一问题从文

作者：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夏商周考古。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献和考古两个方面来解析的，他首先系统地梳理了传世文献，指出这些文献所载“夏”的史迹，只能让我们了解战国秦汉人眼中的“夏王朝”是什么样，而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待。可以说，这部书是融谨严的考古学分析与对文献中所遗留史影的总体把握于一身的。

冈村教授对“夏王朝”的认定，是建立在考古学分析的基础上的。他指出“夏王朝”的上限还不能确定，只是认可了中国学者关于二里头与偃师商城时空和族群关系的推理，认为这应当就是夏商分界的考古学证据，即找到了“夏王朝”的下限，从而确认二里头为夏王朝的遗存，由是提出“夏王朝存在论”。

如果我们认可考古学属于广义的历史学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该承认考古学能够做的更多是解释而非实证。尤其在早期历史的探索中，“真相”是无从验证的，所以“正确”与“错误”之类的断语并不合适。

从这个意义上讲，冈村先生的“夏王朝存在论”也是一种推断而非实证。但到目前为止，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说法，不能不说仍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假说。

三 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观察

从学术史上看，包括夏鼐先生在内的众多学者对“夏文化”的定义，都有从考古学局限性的角度反思的必要^[5]。

作为1950~198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夏鼐的态度和言论在这段学术史的每一个时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夏鼐在1962年发表的综述性文章中，在与夏商相关的文化的定性上非常谨慎：“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岗更早的文化遗存。”^[6]这相当确切地给出了当时考古学在夏商文化探索中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由于考古学的局限性和出土资料的限制，到目前为止，这一结论仍未被突破。显然，就早期王朝与族属的研究而言，早于殷墟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已进入未知的领域。

但在随后的夏商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夏鼐关于在文化命名上要慎用族名的叮嘱并没有被很好的贯彻。即便是怀有上述清醒认识的夏鼐，在主政考古所时，还是认可考古所的发掘简报中对二里头宫室建筑给予明确的朝代定性。^[7]

1977年11月，夏鼐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指出关于“夏文化问题”的论证前提是两个“假定”：“首先应假定：①我们探讨的夏王朝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像有些疑古派认为可能没有夏王朝。②这个夏文化有它一定的特点。发言的同志虽然没有说明这二点，看来大家想的是差不多的。”^[8]

上面这段引文应当包含如下几层意思：第一层，“夏文化”讨论的前提是承认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为信史；第二层，“夏文化”能够在没有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从考古学中辨识出来。此外，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夏王朝存在说”与“夏文化可定说”这两个前提已不被认为是“假定”，而成为深入人心的共识。

这样的自信显然源于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

“由于近代在殷墟发现了商朝后期的甲骨卜辞，其中的有关记录已经基本上证实了《殷本纪》所列商王世系，可见《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也决不会出自史迁的杜撰。

总之，夏朝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9]

“既然商代历史和《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已为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史记·夏本纪》中夏代世系也非虚构。事实上，这已成为王国维以来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10]

这种对夏文化探索的信心与共识显然已偏离了殷墟晚商王朝得以确认的根本前提，即地下文字材料与古典文献的互证。这样的共识与其说是实证的结果，勿宁说是一种情结。或像上引文所言，是一种“共同信念”。

夏鼐在1977年登封现场会上的发言中，正式对“夏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即：“‘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11]可以说，这一界定决定了相关讨论的路向。其中包含了狭义史学中的政治实体、确切的时段（“夏王朝”）和具体的族属（“夏民族”）概念，而这些恰恰都不是考古学所擅长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此后，多数学者接受这一说法或仅对这一界定有所修正。

邹衡的表述是：“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12]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夏文化问题”条的定义是：“中国考古学以探索夏王朝时期在夏人活动地域内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目标的学术课题。”^[13]

直到近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夏文化”的定义仍是：“‘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需要说明的是，夏文化、商文化同后来的宗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一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名称。”^[14]

值得注意的是，夏鼐曾明确指出“历史时期中的‘殷周文化’、‘秦汉文化’，或‘隋唐文化’，这里所用的‘文化’一辞……与考古学上含有特定意义的‘文化’，严格说来，是要加以区别的。”^[15]但在后来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学者们更倾向于把以族属命名的文化看作是考古学文化。

显然，夏鼐关于“夏文化”的界定奠定了日后夏文化讨论的基础，与此同时，它的提出也就决定了这一讨论的结局。回顾研究史，问题不言自明。夏鼐在上引登封会议发言的总结中作了乐观的预测：“虽然这次会上没有能够作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离做结论的日期是一天比一天近了。”^[16]然而，纵观数十年的论战，二里头文化究竟属夏属商仍在争议中，主流观点摇来摆去，无法认为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些论题，可以认为都是在无从验证的假说的层面上进行的，已超出了考古学所能解决问题的范围。

四 近年的发现与新思考

关于夏商文化的定性问题，我个人的观点偏于保守，认为考古学、文献史学两大话语系统能够契合的上限，是殷墟文化——商王朝晚期的遗存。再往前，就是所谓的“原史时代”^[17]。在当时的有足够的历史信息的文书发现之前，文献上的族群、国（王朝）、都邑等，都无法与具体的考古遗存“对号入座”，无法得到确认。因而在我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暂时只用考古学的定名。

我非常赞赏冈村教授在《夏王朝》中的称谓：“郑州城”而非“郑州商城”；“偃师城”而非“偃师商城”。至于二里头，本人不敢断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即为

夏都和夏文化，因为我们排除不了它属于商都和商文化（甚至其他国族？）的可能。因而，对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期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日本学者西江清高教授等倡导的“初期王朝”的提法^[18]是妥当的。

年代上进入了文献所载夏王朝纪年的龙山时代晚期，在考古学上并没有发现与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头文化规模相近、属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核心文化”遗存。在中原腹地，我们见到的仍是不相统属的小的地域集团及其中心聚落林立。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新砦等遗址（群），都属于这类遗存^[19]。由于在所谓的王朝诞生传说地、时值“夏王朝”早期尚未发现与“王朝”相称的气象，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它们归为“前王朝时代”。

新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主干道路网、前后多院落的大型宫室建筑，带有围垣设施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含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20]，这些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最早的。新近发掘的5号基址就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与同时期的3号基址东西并列。后者以院内发现成组贵族墓，其中一墓以出有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而著称。两座大型建筑都是至少三进院落，5号基址在发掘区内的面积已超过2000平方米，向南伸出发掘区。鉴于3号基址被二里头文化晚期的2号、4号等基址所叠压，具体面貌不详，5号基址是迄今所知保存最好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宫室建筑^[21]。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宫室建筑群以北的巨型坑中用幼猪祭祀的遗存也始见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为偃师商城宫城内发现的国家级祭祀场的源头^[22]。依最新的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研究，二里头聚落中以猪的饲养最具规模，黄牛和羊（以绵羊为主，也有部分山羊）有外地来源的迹象，但在晚期都有本地饲养增强的趋势^[23]。

虽然在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中，还没有发现如二里头文化晚期那样的宫城、以酒器为中心的青铜礼容器群（已有陶、漆礼容器群）等，但从上述迹象看，中原初期王朝的都邑制度、宫廷礼制产生的时间可能上溯至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五 系列测年数据提出的问题

目前中国大陆的测年技术，已进入高精度系列方法测年的新阶段。由于在有直接层位关系的遗存单位中采集成组的样品，产生系列数据，可以给以往的单个样品过于宽泛的年代数据加以限制，所以精确度有所提高。而从这样的视点看，以往基于单个数据对二里头文化年代所做的讨论，就略显粗疏了。

到目前为止，与初期王朝时代相关的测年数值，有两个难以动摇的支点。一是郑州出土二里岗文化晚期（二里岗上层）一段的水井木料（保存状况极好）所测数值，为公元前 1400 ± 8 年^[24]；一是新砦遗址第二期遗存（一般称“新砦期”，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下，称为“新砦类遗存”更为合适）标本的数值，约当公元前1870年至前1720年（由北大、社科院考古所、奥地利维也纳有关机构三方测出并加以比照）^[25]。

但具体问题还有讨论的余地。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依最新系列测年的结果，是公元前1750年至前1530年之间^[26]。但这一测年结果，是以“新砦类遗存”绝对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为前提的。鉴于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没有发现“新砦类遗存”晚段和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的遗存单位的直接叠压打破关系，加上文化面貌上的共性，包括本人在内的若干学者认为“新砦

类遗存”晚段和二里头一期早段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如是，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可能会达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

至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与二里岗文化早期（二里岗下层）一段的关系，也因为二者没有直接的叠压打破关系，而不能断定为绝对的早晚关系。在即将完成的《二里头（1999~2006）》田野考古报告中，我们就把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与二里岗文化早期一段在分期上归为一个段别。

大体相当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岗下层一期和偃师商城第一期的这类遗存中，含有浓厚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文化因素，很难从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中划分出来。从二里头遗址新的发掘材料看，“偃师商城第一期的年代，大致同郑州以C1H9为代表的二里岗下层一期相当，又同二里头遗址V区H53和Ⅲ区H23为代表的二里头四期（晚段）相当”^[27]的论断是合适的。

由于二里头文化下限年代的确定也是以二里岗文化早期为参照系的，与上述“新砦类遗存”的情况相同，其年代下限也可能稍晚，达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

如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早期（二里岗下层）就被卡定在公元前1800年至前1400年这一时间段内。约400年的这段时间被划分为五期9段，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所示。

“新砦类遗存”	二里头文化	二里岗文化
早段 1870~1790BC		
晚段 1790~1720BC	一期早段 1800BC/1750BC~	
	一期晚段 ~1705BC	
	二期早段、晚段	
	三期早段、晚段	
	四期早段 1565BC~	
	四期晚段 ~1530BC/1500BC	早期一段 1509~1465BC
		早期二段
		晚期一段 1415~1390BC

如果我们认可《竹书纪年》等文献中的夏商纪年，那么，二里头文化的主体究竟在夏纪年范畴内还是商纪年范畴内呢？如果我们认可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这两个不同考古学文化同属于商王朝的文化，那么为什么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人们共同体（商王朝）的文化？一言以蔽之，到目前为止，在有关“夏王朝”的研究中，我们还没有证据可以排除任何一种假说提示的可能性。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在座的冈村秀典教授的意见作为今天演讲的要旨：

尽管日本学界的风向有所转变，但并非夏王朝的实际存在已有了确实的证据。

我们现在要直面的问题，不是夏王朝的实际存在与否，而是要搞清在已被甲骨文证明了殷王朝之前，是否存在可称为王朝的王权和政体；如是，它是否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王朝，其政体具有怎样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特质。考古学可以充分发挥其特长之处，舍此无他^[28]。

附记：本文为2012年1月18日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演讲提要。

注 释

- [1] 飯島武次：《中国考古学概論》，同成社（東京），2003年。
- [2] 岡村秀典：《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講談社（東京），2003年。
- [3] 宮本一夫：《神話から歴史へ——神話時代 夏王朝——》，講談社（東京），2005年。
- [4] 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 [5] 许宏：《高度与情结——夏鼐关于夏商文化问题的思想轨迹》，《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 [6]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红旗》1962年第17期；《考古》1962年第9期。
- [7] 例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 [8]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 [9]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1]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 [12]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 [13] 殷玮璋：《夏文化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5]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 [16]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 [17]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 [18] a. 西江清高：《1987年の動向：中国——初期王朝時代》，《考古学ジャーナル》第291號，1988年。
b. 小澤正人、谷豐信、西江清高：《中国の考古学》，同成社（東京），1999年。
- [19] 许宏：《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东方考古》第9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 [20]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 [21] 赵海涛、许宏、陈国梁：《二里头遗址宫殿区2010~2011年度勘探与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4日。
- [22] 赵海涛等：《二里头遗址宫殿区2010~2011年度勘探与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4日。
- [23] 赵春燕等：《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来源初探——根据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考古》2011年第7期。
- [24]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 [25] 张雪莲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 [26] 张雪莲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28] 岡村秀典：《夏王朝——中国文明の原像》“补论”，講談社学術文庫版，2007年。